

试论中国农书的起源*

惠 富 平

(西北农业大学古农研究室, 陕西杨陵·712100)

摘 要 本文系统分析了农书起源的过程和因素, 指出农书萌芽于夏商周, 形成于战国时期, 并论述了农书起源的文献意义和对传统农学的影响。

关键词 中国农书, 起源, 意义

中图分类号 G257.39, S-092

农书的起源以农业生产知识的积累为基础, 以书籍载体的出现为前提。原始农业时期, 人类种植牧养的经验仅限于口传手授, 只有在文字和书籍产生之后的商周时期, 农事知识之记载才成为可能。由于农时掌握在早期农业活动中居于首要地位, 有关的技能和经验便最先累积为一定系统并被汇编成书, 作为指导生产的知识体系。商周时的《夏小正》可看作农书萌芽的标志。春秋战国时期, 传统农业逐步确立, 土壤耕作的原理原则和技术措施有了很大发展, 加之当时学术环境优宜, 专门农书最终形成。农书的起源, 不仅对我国历代农学著作的内容、体例有深远影响, 而且可由此探知中国传统农学的特征及渊源。

1 农书的萌芽

原始农业时期, 人类农业生产知识潜育在植物栽培和动物驯养之中, 没有从农事活动中分离出来, 后来因农业生产的需要和文字的发明, 有关各种知识便按一定顺序从某些领域摆脱生产过程而独立出来。恩格斯^[1]指出: “首先是天文学, 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定季节, 就已经绝对需要它。”显然农时掌握的知识优先得以发展, 农书起源以此为生长点。

1.1 农书萌芽的条件

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若干原始农业遗址中曾出土了大量粟米、稻谷、家畜骨骼及农业生产工具, 表明当时农业已达到一定水平, 人们在长期的采猎、栽培驯养过程中掌握了许多生产、生活知识, 一些历史文献的记载也证明了这一点。从这些文献中还可看到当时耕播收获经验的传播方式。《周易·系辞下》: “神农氏作, 斫木为耜, 揉木为耒, 耒耨之利, 以教天下。”《淮南子·修务训》也有神农“教民播种五谷, 相土地宜”之事。《史记·周本纪》则有周始祖后稷擅长农耕, “民皆法则之”的记载, 还说帝尧得知后稷事迹, 遂推举他为农官, 教民稼穡。在没有文字、书籍的情况下, 先民们农业生产实践的知识和经验只能汇聚、寄托于“农神”, 并依靠这种带有神话色彩的方式传播交流。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是后来农书的远源。

农书起源以书籍的产生为前提。《尚书·多士》载: “惟殷先人, 有典有册。”甲骨文和青铜铭文都有“册”字, 其形状很像用绳子串起来的竹木片, 而“典”字则为双手捧册之形。“册”实际上就是早期书籍——简牍。虽然战国秦汉简牍才有实物证据, 但其出现无疑要早

收稿日期: 1993-04-21.

* 本文承业师张波教授指导。

得多,许多文化史专家都认为我国至迟在三千年前的殷商时期就有了书籍。农书起源具备了物质依托。

农书萌发更要有系统的农业生产知识和经验作为其材料来源。商周时的农业生产水平和人类的认识规律决定了有关农时掌握的知识首先丰富起来汇成一定体系。上古农业生产水平低下,人们主要依靠简陋的木石工具开垦、种植和收获,农业技术措施十分薄弱,提高作物收成的能力极其有限,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天时恩赐;加之当时天文历法还不成熟,农时掌握在农业活动中便显得最为突出。夏商周三代的主要活动地区在黄河流域,其四季分明的气候特点愈加显示出适时播种的重要性。生产的需要促进了农时知识的普及和历代王朝对农时的重视。其一,商周之时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人民对于农事活动有关的物候和星象很熟悉。《诗经》中可见到很多草木荣枯的记载和观星经验,《诗经·邶风·七月》还涉及到一年四季各种农活的安排。其他先秦文献亦不乏有关物候和天象形象而准确的描述,它们显然都是劳动人民的经验总结。明末进步思想家顾炎武曾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2]可见根据物候和星象把握时令季节是夏商周的一项基本生产、生活常识,这无疑为农书起源积累了材料。其二,三代王朝将农时掌握看作为政的重要内容。相传黄帝“迎日推策”^[3],帝尧“敬授民时。”^[3]夏代有掌天地四时之官,而且唯对这一官员要求甚严,“先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杀无赦。”《尚书·胤征》也确有历官“废时乱日”受到严惩的记载。显然农时掌握在当时生产中具有决定意义。现存我国最早农历书《夏小正》的基本内容在这时已经具备大约不会虚妄。商周时期更加重视设官观测星象,掌管农时,天文历法有较大进步,明确提出“食哉惟时”的观点,为农书萌芽创造了条件。随着书籍的产生,商代或商周之际便整理夏代历法而成以时系事的政典《夏小正》,作为指挥平民和奴隶按时进行农业生产的依据^[4],农时有了系统记载,农书由此萌芽。

1.2 农书萌芽的标志

《夏小正》全文463字,明确区分一年为十二个月,并将物候和天象结合起来表示时令季节,特别是几乎每月都标有一定的农事,其中包括修理农具、春耕、饲养小羊、修剪桑树枝条、养蚕、种麦等各种生产活动。其农时记载具体、系统,被公认为我国最早的农历书,而且和《诗经》一起被称为研究春秋战国前中国社会历史和农业史最可靠的文献资料。^[4]

从农业史的角度完全有理由将《夏小正》看作农书萌芽。第一,近代大多学者认为《夏小正》成书于春秋之前,夏纬瑛先生考证说其经文成书年代可能是商代或商周之际,最迟也是春秋以前居住在淮海地区沿用夏时的杞国整理记录而成的^[6]。原始社会末期直到春秋前期,确定农时以随时观测星象出没、物候变化为依据,观象授时、物候指时与农事紧密结合在一起,有关知识经过长期积累和传沿最终形成文字作品。《夏小正》的出现及其内容、体例正说明这一点。第二,《夏小正》只在一年的农忙季节逐月标明群众最熟悉的若干星象为定时标准,并非每月都有天象,其天象、物候显然是为农事安排服务的^[5]。第三,上古时期,学统于王官,《夏小正》只能以政典形式出现,作为统治者督管农业生产的依据。这似乎和后世官方农书是一脉相承的。第四,后世月令体农书以及综合性农书的体例可上溯至《夏小正》。总而言之,《夏小正》的时代、结构、内容及作用均表明它的农书性质,如果系统考察,《夏小正》只是农书的萌芽状态并未完全成形。因该书毕竟是春秋之前社会的产物,当时的农业生产状况和人们的认识能力决定了其天文历法部分占较大篇幅,所记农事

仅是一般性描述,缺乏技术细节,形式上是一种农事历;作为一种政典,其中又夹杂了一些有关政事方面的记录。《夏小正》距真正的专门农书还有一定距离。

2 农书的形成

文献表明,农书产生于战国时期,这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密切相关。从现存的《吕氏春秋》“上农”四篇、《管子·地员》等农学论文来看,战国农书的内容和结构与农书萌芽时相比已有很大进步,但也不无联系,体现出农书由萌芽到形成的完整过程。

2.1 农书出现的时代

班固《汉书·艺文志》始设“农家类”著录农书九种,其中指明《神农》、《野老》是战国时代的著作。据班固附注,《神农》为“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的作品;《野老》“在齐楚间”,其余七种或为汉时人所作,或说“不知何世”;现代农史学家研究认为其“不知何世”者多为汉代著作。有不少学者根据战国和汉代农书的引述,认为战国时还有一种《后稷农书》,它的产生要比《神农》、《野老》为早,有的甚至将其时代上推至春秋^[6],并说因为该书早已亡佚,故《汉书·艺文志》未见著录。石声汉等前辈学者则对先秦是否有过《后稷农书》持存疑态度。可见农书至迟在战国时已经产生。

农书产生与战国时期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学术背景分不开。当时铁农具的推广、牛耕的使用使社会生产力有了大幅度跃进并促进了社会制度的变革,“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的个体农户得以巩固和发展,出现新兴封建地主经济,以精耕细作为特色的传统农业由此确立。围绕土壤耕作,传统农业技术全面形成,为专门农书的出现积累了大量素材。另外,春秋战国时期列强呈雄,诸侯争霸,文化思想领域也空前活跃,对于社会大变革中遇到的一系列政治、经济问题,人们各执其说,争论不休,并涌现出不同学派相互辩难,著书立说。值得注意的是战国时期士人大增,身份降低,已归入“四民”之列,在求取功名的同时,亲自参加农业劳动以谋衣食已不足为奇。这些人在劳动过程中必然要了解和掌握有关春播秋收的知识,但除督导农业生产的农官外,能出于一定目的对当时甚至以往的生产经验加以全面总结的,仅有被称为“鄙者”的农家学派。班固认为“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前者已成为劝勉耕桑,研讨农学的主体。农家在传统农业技术知识长期积累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编定出能表达本学派思想见解的专门农书,并将之托始于“神农”、“后稷”等传说中与农业有关的人物。同时,春秋之后各国均强调农为邦本,而重农就要讲农作之道,这是农家学派之立足点,其“君臣并耕”主张亦可能由此衍发,因而在农业技术措施记载之前冠以重农说教或政治观点便成为农书的基本结构,其目的在于抬高农书身价。总之,诸子之一的农家学派以讲求农业生产技术为基点,从重农劝耕方面立言发论,阐述其政治经济主张,农书应运而生。

2.2 战国农书内容的进步

先秦专门农书悉已亡佚,只可在现存战国末期的杂家著作《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农学论文和其他先秦文献中略见一斑。《吕氏春秋》系秦相吕不韦门客集体编撰,其中有“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有关农业的篇章,特别是各篇并非互不相关,而是联成一个体系^[7]。向来被看作现存最早的农书。虽然其作者已站在儒家立场上,撕去了农家的政治标帜,但是却继承了农家学派所总结的农业技术知识,故由这四篇农论即可考察当

时农书内容之端绪,其他文献可与之相辅。

首先是战国农书中土壤耕作和作物栽培技术有很大进步。《禹贡》、《周礼》、《管子·地员》等战国文献均对土壤色质及土壤与农作物的关系有详细分析。《吕氏春秋》“任地”诸篇则进一步提出土地整理、土壤改良等农业生产的十大重要问题及其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技术措施,如针对土壤性质的“力与柔,息与劳”等五种矛盾关系,提出五条耕作原则及“上田弃亩,下田弃畎,五耕五耨,必审以尽”等具体耕作方法;对耕作栽培不良造成的“地窃”、“苗窃”、“草窃”尤为注意,提倡中耕除草和条播以防止此“三窃”的发生。这些均是农业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表明人们的农业活动已由顺应天时逐渐转向改善土壤条件及作物生长环境方面。从《夏小正》到《吕氏春秋》“上农”四篇,农书内容有了突破。

其次,战国农书对农时的认识趋于深入合理。《吕氏春秋》“上农”诸篇始终贯穿着重视农时的思想,在耕种、收获的各个环节上都强调农时掌握的重要性。“上农”篇将“敬时爱日”,防止“为害于时”作为扩大土地生产力的关键措施之一;“任地”篇前10句有关土壤耕作原理、原则,而后面15句则讲了“耕种收获之时”,并用节气和物候将之标示出来;“辨土”和“任地”相互提携,主讲土壤耕作,不过仍很重视时宜。据夏纬瑛先生研究,原文中“夫四序参发”该是讲种地应有的时宜的起语,但是下文脱失^[6];“审时”篇则专论农时,起篇就开宗明义:“凡农之道,候之为宝”,接着讲述了得时、先时和后时对作物产量及品质的影响。可见四篇农论中有关农时的记载仍占较大比例,与农书萌芽有内在联系,不过农时掌握已不作为其重点内容,文中只强调耕播收获要适时并将之与庄稼丰歉联系起来。当时历法的进步和二十四节气的发明使人们只要观看历本就可知晓农时,随时观察物候和星象似无多大必要,顺应农时只作为安排农业生产的必要前提而被随时提及,农业活动的中心转向土壤耕作改良,“上农”四篇的名称和排列也反映出这一点。

3 农书起源的意义

农书起源是系统总结我国传统农业技术知识之开端,此后我国古代农学著作层出不穷,内容、体例时有创新,成为中华民族一大类颇具特色的科技文献。今天可从农书的源流探知我国古代农业的发展脉络。

3.1 从农书自身看

《夏小正》原有的农事历作用随着春秋末期天文历法的进步而逐渐消失,但作为农书萌芽,其体例却在后来的农书、文献中不断沿革。比它晚出的《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和《淮南子·修务训》等都有沿袭《夏小正》以时系事的部分,只是内容复杂多了,还夹杂了一些迷信的浮言虚辞。这些月令书又成为以后许多农书的资料来源和结构依据。石声汉先生曾肯定《夏小正》和《礼记·月令》是农家月令书的基础^[7]。其他类型的农书也与《夏小正》体裁有联系,如综合性农书《农政全书》、《授时通考》、《沈氏农书》、《三农纪》等在有关卷首设专篇讨论时宜问题。《齐民要术》未列时宜项,但书的各部分对前人月令书的材料大量引用。专业性农书同样不乏时事相系的体例。石声汉先生的“农书系统图”对上述源流关系有明确反映。由《夏小正》到《管子·地员》、《吕氏春秋》“上农”四篇,农书逐渐成形。“上农”诸篇以重农说教发端的体例为后世农书所沿用,其土壤耕作部分的总论性质也对后来农书有深远影响,其中记载的耕作原则、播种方法、中耕技术和重视农时的观念等直接为

以后的农书继承、发展。文中提到的“凡耕之道”、“凡农之道”、“耕之大方”等精辟的语句以及天、地、人三才一统的思想亦被历代农学著作不断阐发。《汜胜之书》所见的“凡耕之本，在于趣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获”；《齐民要术》中的“顺天时，量地利”，以至明清农书论述的“三宜”理论无不是“三才”思想的再现。《管子·地员》对土壤以及土壤和植物关系的专门研究则成为后代农书有关作物地宜分析的源头。

3.2 从传统农学的角度看

农书随我国传统农业的逐步确立而形成，集中反映了当时的农业科学技术水平，是探索传统农学思想和技术渊源的凭据。《吕氏春秋》“审时”明确提出：“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联系“任地”篇“地可使肥，亦可使棘”的观点可以看出当时已注意到人力难以改变天时，只要掌握春生夏长、秋敛冬藏的规律不失时机地耕耘、收获即可，提高作物产量主要依靠人力以一定手段进行合理耕作栽培来实现。“三才”理论成为中国传统农学思想的核心，指导中国农业形成自己独特的精耕细作技术体系。《吕氏春秋》农业篇仅论及作物种植，虽提到蚕桑和家畜，但对有关技术只字未谈，可见中国农业在那时已形成以种植业为主体的生产结构，至今未有根本变化，这是中国农业区别于西方农业的显著特征之一。中国农业的诸多优良传统可上溯《管子·地员》、《吕氏春秋》“上农”四篇等农业文献。“因地制宜”可在“地员”篇初见端倪；“任地”诸篇深入探讨了土壤耕作技术，“耕耨”连称，对中耕除草尤为关注。《吕氏春秋》四篇农论所总结的垄作方法和理论是后世垄作的基础，其中提出的“上田弃亩”等土地利用方式则成为后世畦作、区田的先驱，农史学家对此多有论述。农书起源奠定了中国传统农学成长的基础。

参 考 文 献

- 1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149
- 2 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上海:上海锦章图书局印,1927.5:32
- 3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6:16
- 4 夏纬瑛,范楚玉.夏小正及其在农业史上的意义.中国史研究,1979(3):141
- 5 夏纬瑛.夏小正经文校释.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80
- 6 李根蟠.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的时代性.农史研究,1989(8):56
- 7 石声汉.中国古代农书评介.北京:农业出版社,1982.13
- 8 夏纬瑛.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北京:农业出版社,1979.66

On 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Ancient Agricultural literatures

Hui Fuping

(The Ancient Agricultural Literature Research Institute, Northwester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Yangling, Shaanxi, 712100)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process and factors of 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Ancient Agricultural Literatures systematically and points out that it originates in the periods of the Xia, Shang and Western Zhou dynasties in the Chinese history and also shapes in the period of the Warring States. Also,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effects of literature significance of its origin upon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Key words the Chinese Agricultural Literature, origin, significance